

朱今明:中国电影界的“金牌摄影师”

□史文



朱今明



朱今明在拍摄工作中

名人与南通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

朱今明(1915—1989),原名朱镜明,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摄影师、导演。代表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蔡文姬》《孔雀公主》等。

1915年9月22日,朱今明出生于南通市区西南营,父亲是清末秀才,教过书,办过学,朱今明为家中独子。朱今明在南通崇敬中学读书时,与同样爱好文艺的同学赵丹、顾而已、钱千里结为好友。少年时与小伙伴们经常到赵丹父亲开办的新新大戏院免费看戏。除文明戏和京剧外,最让朱今明着迷的是电影,常常是手里拿着“缸爿夹油条”(南通人爱吃的一种早点),衣兜里放上几块脆饼(南通特产),在黑洞洞的影院里“蹲”上一天。在赵丹、顾而已等同学自发组织的小小剧社里,朱今明承包了布景、道具、场务等事务,是剧社的骨干。小小剧社演出的进步话剧,由于赵丹等人的精彩表演获得成功,并走出校门登上新新大戏院的舞台举行公演,轰动全城。

1933年夏,当剧社准备进行第七次公演,演出剧作家洪深的著名话剧《五奎桥》时,南通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认定《五奎桥》宣传共产党暴动,剧社里有共产党人,阴谋在演出时实施抓捕。南通城里笼罩着白色恐怖,演出难以进行,剧社成员决定转移。朱今明首先将赵丹、顾而已护送至轮船码头,让他们搭上轮船先行前往上海,然后再考虑自己的出路。

1934年,朱今明经赵丹介绍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摄影。1936年,他离开影片公司,加入业余实验剧团,负责舞台照明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到前线宣传抗日。1939年6月,为宣传抗日并开拓新的艺术道路,他与赵丹等一行10人从重庆奔赴新疆。不料,他们抵疆不久,军阀盛世才便撕下亲苏、联共的假面具,大肆逮捕革命人士,朱今明、赵丹等人先后被捕、关押,受尽折磨。经周恩来组织各方力量营救,1945年4月,朱今明、赵丹等人回到重庆,受到重庆影剧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还邀请他们到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用餐。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也接见了他们。

不久,朱今明加入了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担任技术部主任兼摄影师。

在此期间,承担了由著名导演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故事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影任务。当时昆仑影业公司的技术设备很差,用于拍片的摄影机只有一个镜头,被戏称为“独眼龙”。朱今明用这台“独眼龙”拍摄出了高水平的画面。《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后获得观众空前热烈的欢迎,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连映三个多月,创造了票房纪录。此后,朱今明又拍摄了《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和根据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的《三毛流浪记》等故事影片。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上海即将解放。中共上海文委派人与朱今明联系,要他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国民党军队溃退的场景。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朱今明做了一个木头匣子,将摄影机放入匣内隐藏起来,在机器开关处挖了个洞便于操作。他抱着匣子,冒着生命危险,挤进纷乱的人群,拍下了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狼狈不堪的真实映像以及上海市民准备迎接解放的生动画面。这些珍贵镜头日后都被编入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中。朱今明被文化部授予优秀纪录片一等奖奖章。

1954年,朱今明随中国电影实习

团前往苏联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考察。回国后,文化部电影局决定重建北京电影制片厂,实习团全体成员留北京参与建厂,朱今明即从上影正式调入北影,任技委会主任兼总摄影师。1959年,他为著名导演、演员金山执导并主演的故事片《风暴》担任摄影。《风暴》连同北影当年生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林家铺子》成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

1965年,由朱今明担任摄影的故事影片《烈火中永生》上映。该片改编自小说《红岩》,由著名演员赵丹、于蓝等主演。影片讴歌了以江姐、许云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白公馆和渣滓洞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朱今明曾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金牌摄影师’”。

“文革”期间,朱今明遭到关押迫害。1974年春,朱今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影厂,担任影片《烽火少年》的摄影,此时,他已阔别摄影机八年。1979年,为纪念郭沫若逝世一周年,朱今明将郭沫若编剧、北京人艺的优秀剧目《蔡文姬》搬上了银幕。1982年,朱今明与他人联合执导了由唐国强、李秀明、陈强主演的神话爱情电影《孔雀公主》,影片获得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儿童故事片首奖“水晶蝴蝶杯奖”。



习俗杂谈

记忆中的“听唱书”

□杨汉祥

不久前回通东农村老家小住,与儿时几位伙伴聊着过去一些人和事,大家自然都想起当年常去“听唱书”的往事,尤其对书场上热闹欢乐的氛围,听众如痴如醉的情景格外记忆犹新。大伙儿感叹道:如今在我们通东一带不但书场没有了,连“唱书”艺人也不见了,要想“听唱书”,只能从收音机里过过瘾。

所谓“唱书”实际上就是“评书”,有的地方称“说书”,而我们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则称其为“唱书”。现在除了一些广播电台还保留这一节目外,包括我们通东城镇在内的各地城镇极少再有这种娱乐活动了。然而在三四十年前,这是民间一项很热门的文化娱乐活动,各地城乡都设有一些书场。就说在我老家所在的那个三余小镇上,正式挂牌的书场就有三家,只是里面条件很简陋,一般在大堂一角摆上一张小桌当“唱台”,下边再摆一些桌椅板凳就行。至于一些非正式书场,有的附设在茶馆店里,人们进去既喝茶又兼带听书,门票费就打在茶钱里;有的书场是借用一些乡村小学的教室,只不过仅限于星期天或晚间开场,因为学生放了学,教室才能“变身”为书场。

由于那时候喜欢“听唱书”的人多,所以从事“唱书”的艺人也多,他们大都不是科班出身,应该也算是“自学成材”。只要有点文化、记性好、能说会道、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加上会一些小口技、小演技,就能从事这项技艺。他们平时把从书上看到或从别人处听到的一些经典或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熟记在心,开“唱”时只要在故事情节上作一些“添油加醋”,在表述时加一些特殊语气、表情、动作与声响,这样“书”自然会“唱”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唱书”虽说靠的是嘴上功夫,其实在那时也算是一个清苦行当,“唱书”人首先要备一身像样的行头,同时还要梳上大包头,戴上平光眼镜,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且有艺术气质,平时吃住在外,四处为家,加上还要经常赶场子,有时一天要“唱”好几场,而由于书场门票价格很低廉,所以他们的收入只够勉强养家糊口,想靠“唱书”发财不太可能。

我刚接触“书场”是在孩提时代,是我爷爷带我去的,至于台上“唱”什么我听不懂,只知道书场上人多热闹,大人们在里边听,我就和其他小孩在场外疯玩。那时书场边上还有不少卖小吃的摊贩,爷爷在那儿也常给我买些糖果、瓜子之类,所以我也乐意跟着去。偶尔我也坐在爷爷身旁听一阵,只记得书场正前方有一张围着布帏的小桌,“唱书”人端坐在桌前,手持一把纸扇当道具用,桌上摆有一块“惊堂木”,时不时拿出来拍一下。在“唱”的过程中,还经常配上一些通过口技发出的风声、雨声、雷声、枪炮声等,而且这些声响十分逼真,比如“唱书人”拍“惊堂木”时发出的脆响,往往把一些抱在大人怀里的小孩吓哭;“唱书人”嘴里发出老虎、野狼等凶兽的嚎叫声,往往会使场上的小孩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

到我上学后会欣赏一些“唱书”艺术,并能听懂其中一些内容时,也会抽空与同伴们去听“唱书”,记得那时“唱书”的内容很杂,但都算是健康向上的,毕竟有地方文化部门管理。“唱”的无非都是《杨家将》《武松》《三打白骨精》之类;另外是一些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战斗故事;也有一些地方上流传的奇闻趣事、名人轶事之类。他们在开“唱”前,先要在书场外贴出《告示》,告知所“唱”的书名、内容简介、书场地址、门票价格等,有点像现在电影院门口张贴的海报。在场次上分单场与连场两种。单场就是一个故事当场就讲完;连场就是把一个长篇故事分成若干场讲完,一场书大约在两小时左右,每一场书都有一个题目。每一场结束时正好也是故事最精彩之处,大家在此时听得最尽兴,然而“唱书”人像卖关子似的突然停“唱”,并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结束,为此弄得听众心里痒痒的,只想听下一场。这就像现在电视台播放连续剧一样,一场接一场地衔接得恰到好处,观众会忍不住一场接一场地去看。

过去包括我们通东地区在内的许多书场生意兴隆、喜欢“听唱书”的人也多,原因在于那时文化娱乐活动少;“唱书”又无需多少人手、设备,加上门票便宜、内容耐听;再说过去群众文化普遍低、看书读报机会少,所以,“听唱书”自然成了当时人们获取知识、享受娱乐的最佳选择。而现在电影、电视、戏剧等娱乐活动多,人们普遍有文化,供他们阅读的书刊多,接收各类故事的渠道也多,根本用不着坐在书场里听说书人慢慢讲,所有这些,都是造成如今各地书场消失、“唱书”艺人转行的原因。

南通的民间工艺品

□王士明

传家宝

南通的民间工艺品历史悠久,据地方志载,早在南宋时通州就有春节、元宵闹花灯的习俗,到了明清时此习俗更盛。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包灯,州人包社行制,以蛇蜕通草装潢而成。”有“提灯”“座灯”等,取材于花鸟、瓜果、鱼虫等。

包灯传人石紫寿、钱桂亭是如皋的扎灯能手,善制各式绢灯和宫灯。绢灯的造型以鸟灯为主,还有瓜果、草虫、鱼虾等。宫灯的造型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框架用竹篾扎制,或用红木雕镂而成。框架的外面糊绢,绢上饰以绘画、书法或刻纸,内容为四时风景、吉祥纹样或戏文。造型绢灯有挂式与座式之分。挂式灯有传统的龙、兔、蟹、虾、蛤蟆灯和金瓜、蝴蝶、荷花、金鱼等形式。大型座式灯有八仙过海、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百鸟朝凤、龙凤呈祥等。

1963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建立灯彩小组,钱桂亭传授以鸟灯、鱼灯为主的造型绢灯制作技艺。代表作有《喜鹊登梅》《松鹤延年》《凤凰牡丹》《荷花金鱼》灯等。各种灯彩赴国内外展览,获得好评。1983年以后,鸟灯用通草做花配景,改成拆卸式便于包装,还发展了电动造型灯,体现了南通灯彩的特色。

清代末年,南通风筝已与北京、天津、潍坊齐名,南通遂成为我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风鸢出如皋,自草虫鱼鸟以至仙佛无巧不具,有一排九雁十三雁者,可折叠藏之。”传统形式有老鹰磨云、双燕觅食、双龙戏珠、五福捧寿、天女散花等几十种。如皋著名彩扎艺人石紫寿、钱桂亭是扎风筝的能手。1963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聘请钱桂亭扎制软翅造型风筝,摹拟飞鸟、鱼虫一类的动物造型,有蝴蝶、金鱼、仙鹤、凤凰等,参加国内外展览。

民间扎制的板鹞,是典型的南通乡土风筝,可装200多组哨子,哨子可分高、中、低三个声部,放飞时风入哨口即发出交响共鸣的乐声。南通刻纸是在民间窗花剪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清道光年间的《崇川县志》载:“窗花出西南营,劈纸破、安银晶片、五色绸其中,胶贴成幅。缕纸如丝缀,花样嵌空玲珑。有花盆、花篮、花瓶、

战胜利前,赵合明在南大街创办启新美术社,专营羽绒剪贴画片。

1958年,赵合明应聘加入特种工艺社。1959年,先后制作了金鱼、百蝶、翠鸟等作品。创作孔雀图、芦雁图、双猫图等大件立轴,制作羽花贺年片、书签等小件工艺品出售。1966年参加在广州举办的江苏工艺美术博览会。1972年7月,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重建,恢复南通刻纸生产。1973年刻纸连环画代表作有《西厢记》《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到1966年,刻纸年销量均在10万套左右。

1972年7月,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重建后,恢复南通刻纸生产。1973年刻纸连环画代表作有《西厢记》《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到1966年,刻纸年销量均在10万套左右。堆绢,由南通彩扎艺人高文极创作。是僧侣、道士做斋事的一种道具,后来常作为喜庆送礼之用。题材有花卉、鸟兽、人物等。高文极的传人周广泉于1962年3月应聘于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研制堆绢工艺品。1965年后研制成现代题材的作品《雷锋》等,并参加江苏省工艺美术展览。这一阶段,以真丝、彩色绸缎代替素绸作主材,以绸缎堆褶,替代毛笔勾画衣褶,以中层加包棉花或海绵,代替素绸包纸板,由平面变为半立体,形象突出,造型饱满,具有浮雕感。1974年1月至1981年10月,众多堆绢作品赴美、日、德等国展览。

南通民间工艺品还有丝绸剪贴、竹刻等,就不一一赘述了。

黄包车是何时进入南通的

□何泰

江海风物

人力车(亦称“黄包车”)进入南通之前,轿子是南通居民广为使用的代步工具。南通的轿子具有地方特色,多为竹木结构,长方形,高约1.5米,宽约0.8米,有2人抬、4人抬两种,大多为2人抬的轿子。轿子作为代步工具,如名医就诊、急诊病人就医、达官贵人外出和州官

出巡等,还作为出行的一种仪仗工具,以表示乘坐者的身份。封建社会,官吏与平民使用的轿式不同,官吏的职位不同,使用的轿子也有区别。如知县乘坐4人抬的红漆顶蓝呢轿,而平民百姓乘坐的则是青布小轿。南通民间新娘出嫁,均有乘坐花轿的风俗。民间花轿大多为竹壳花轿,抬起来有“吱嘎——吱嘎——”的响声。黄包车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由在上海的法国人从日本引进,用于营业

的(故黄包车又称“东洋车”),由于黄包车拉起来轻便快捷,且又节省人力,在上海很快时兴。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光绪末年,黄包车即由上海传入南通。清末民初,南通的黄包车迅速增加,且分营业和自备两种。自备车有60余辆,用于营业的有600多辆,南通设有车行9所。继南通引进黄包车后,海门、如皋、海安、掘港等地,也有人先后购置黄包车用于营业。民国初年,黄包车的轮子是“铁箍轮盘”,遇到路上不平处颠簸较为厉害。后来,由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引进了钢圈、钢丝辐条和充气轮胎,乘坐较为舒适了。上世纪20年代初,南通有黄包车700多辆,抗战前,南通黄包车超过2000辆。1949年4月,南通城区有黄包车2860辆。4月10日,在南通市总工会领导下,筹备成立了南通市人力车工会,工会办公地址设在仓巷节孝祠。1950年,人力车工会下设9个分会,后增至11个分会,有会员2144人(其中城区会员1417人)。是时,黄包车是市内重要的运输工具。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民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